

第一章 緒 論

一、選題緣由與題解

漢字在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中，字體紛繁，載體多樣，動態實現形式幾經變化。從縱向分期看，漢字可以分爲古代漢字、近代漢字和現代漢字。楷書是近代漢字的主體，通行時間最長。墓誌是保真度較高的文本載體，興起于東漢，南北朝時走向鼎盛，現存墓誌實物在數量上以隋唐時期爲最多。魏晉—隋唐時期，刻版印刷尚未流行，書寫還是文字實現和傳播的主要方式。魏晉時期，楷書初步形成；南北朝時期，楷字尚缺乏規範，形體紛繁複雜；隋唐時期楷書趨向成熟，有了官方的正字法。有鑒于此，我們選取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書漢字（以下簡稱“常用楷字”）作爲研究對象，揭示其形體、結構和職用屬性特點，以期集中考察漢字發展演變的現象和規律。

魏晉—隋唐屬中國歷史的中古時期，大概跨越七百年時間，是本書研究對象的所處時段。通過表 1.1 可大致了解該時段的歷史變遷。^①

表 1.1 魏晉—隋唐朝代大事表

朝代	約占年數	世紀（約計）	實際年代	大事記
魏晉	200 年	3～5 世紀	220—420 年	五胡之亂（始于 304 年） 晉東遷（317 年）
南北朝、隋	200 年	5～7 世紀	420—618 年	隋統一南北（589 年）
唐	300 年	7～10 世紀	618—907 年	安史之亂（始于 755 年） 黃巢造反（始于 878 年）

“墓誌”是本書研究對象實物文字的主要載體。“楷書”是本書研究

^① 胡繩：《二千年間》，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7 頁。

對象墓誌文本漢字的體態風格。歷代“常用字”具有一定的相對性，本書的“常用楷字”是一個操作概念，我們依據周有光提出的“漢字效用遞減率”，對墓誌楷書最高頻的 1000 字作聚焦考察，從而使研究對象更為集中。“形構用”是考察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屬性的三個維度，即形體、結構和職用。故本書名曰“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形構用’研究”。

二、相關研究述評

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屬於近代漢字的重要組成部分，前人對此期楷書及速寫字體行草書的相關研究，可謂成果豐碩。^①主要包括四大方面：

（一）楷書及行草書字體風格形成的研究

啓功、裘錫圭、秦永龍等先後探討過楷書及行草書字體風格的萌芽、形成，包括筆形、結構等方面，以及楷書與行草書的相互影響等。

（二）漢字構形系統的斷代研究

王寧吸收借鑒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系統論和結構主義語言學內在系統的思想，創建了漢字構形學，以字形為中心，在個體考證的基礎上探討其總體規律。從 20 世紀 90 年代開始，她指導多位碩士、博士研究生遵從統一的理念和操作程式，對古今漢字進行了構形斷代考察，取得豐碩成果，主要表現為“漢字構形史叢書”系列著作。其中，涉及魏晉—隋唐時期漢字構形的有劉延玲《魏晉行書構形研究》、齊元濤《隋唐五代碑誌楷書構形系統研究》等。

（三）文本及字書楷字的形體、結構與職用綜合研究

按照存在形式，漢字可分為文本文字和字書文字。魏晉—隋唐時期楷書文本文字和字書文字之間互有影響，相應帶來漢字整理和規範的許多課題。關於墓誌文本文字的研究，有趙超、毛遠明等關於碑刻文獻的概論性著作；有趙萬里、毛漢光等的碑刻著錄、集釋和文字彙編等整理

^① 有關近代漢字的研究狀況，參徐秀兵：《近代漢字的形體演化機制及應用研究》第二章《近代漢字研究述評》，北京：知識產權出版社，2015 年，第 20-40 頁。

成果，嘉惠學林、功不可沒；還有毛遠明、臧克和、歐昌俊等對墓誌文字的專題研究，如楷書構件的類化、變異、區別特徵及異體字狀況等。

對魏晉—隋唐時期字書的研究包括專書研究、對比研究、字書輯佚和字書疑難字考釋整理等方面。朱葆華、王平等對我國第一部楷書字典《玉篇》進行了研究。由明智、呂浩等對《篆隸萬象名義》進行了專門研究。趙超、劉中富等對唐顏元孫撰《干祿字書》作了專門研究。張金泉和蔡忠霖分別對敦煌新發現的唐代字書《時要字樣》《正名要錄》進行了整理與研究。臧克和《〈玉篇〉的層次——基于“〈說文〉〈玉篇〉〈萬象名義〉聯合檢索系統”調查比較之一》等屬於字書對比研究的代表。在字書的輯佚研究方面，如林源鈞稽北朝代表性辭書《字統》的佚文，介紹其在文字學、古籍整理研究等方面的重要價值。楊寶忠、鄭賢章等對中古以來字書貯存的楷書疑難字進行考釋，揭示大型字書疑難字的來源、探討疑難字形成的原因、歸納疑難字考辨的方法、總結漢字變易的一般規律等。

（四）楷書漢字規範和正、俗字研究

文字規範常由字書來體現，部分字書（如《干祿字書》等）甚至明確標識出字樣的使用場合和正俗地位。20 世紀 50 年代末，蔣禮鴻提倡加強對“俗字”的研究。80 年代以後，字書及文本俗字成為漢字研究的新亮點。張涌泉、陳五雲、曾良、郝茂等將俗字作為考察對象，產生了大量研究成果。唐代興起的字樣學（又稱“正字學”）主要內容是漢字整理和規範。曾榮汾、張金泉、範可育等集中考察正俗字、字樣學等問題，對於當代漢字整理和規範仍具參考價值。

墓誌石刻是魏晉—隋唐楷書漢字的重要載體。自宋迄清，隨着金石學的興起和發展，墓誌石刻文字研究亦取得豐碩成果。在碑刻文字的搜集、整理方面，有清一代涌現出王昶《金石萃編》、顧藹吉《隸辨》、翟雲升《隸篇》、趙之謙《六朝碑別字》等著作。20 世紀初面世的葉昌熾《語石》、馬衡《凡將齋金石叢稿》等論著，堪稱金石文獻研究的扛鼎之作。當代學者對於墓誌等石刻文獻的語言文字及歷史文化價值更為重視，相關知識的梳理更為詳備。趙力光介紹了清代以來墓誌的出土情況，特別是民國于右任“鴛鴦七誌齋”、張鈞“千唐誌齋”、李根源“曲石精廬”等對墓誌文獻的收藏情況，並按照地域和時代對新中國成立以

來考古發掘的出土墓誌進行介紹。^①趙超指出，歷代墓誌材料的價值較之殷墟甲骨文、敦煌藏經洞文書卷子、戰國秦漢簡牘毫不遜色，並估計 20 世紀的一百年間，出土墓誌文本總字數可達近千萬字，實為歷史文化之寶庫，而南北朝隋唐墓誌為研究焦點。^②

隨著現代考古學的興起，以及中國語言文字學從傳統“小學”中獨立出來，尤其是漢字學體系的日益成熟，學界對魏晉—隋唐墓誌的著錄、考釋等工作逐漸形成規模。自漢代到民國各個時段、多個地域（如河南洛陽、安陽，陝西西安、咸陽，江蘇南京、揚州等）的出土墓誌，均引起學者的關注。墓誌文獻的整理程序趨於理論自覺，圖版、錄文逐步形成範式，代表性著作有趙萬里《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文物出版社編《新中國出土墓誌》、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王立軍《漢碑文字通釋》等。魏晉—隋唐墓誌屬於石刻文物文字材料的大宗，然而從純文字學角度進行專門研究尚有巨大空間，有學者指出“六朝石刻具有多方面的研究價值，目前其史學方面的研究十分活躍，而語言文字和文獻方面的研究則相對薄弱”。^③

在數字化時代，以語料庫、字料庫等技術為支撐的墓誌文獻資料庫的建構方興未艾。王寧《數字化時代的碑刻與碑刻學研究》指出：“運用現代信息手段貯存、整理、研究碑刻，是現代碑刻學發展的趨勢。”^④北師大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成立初期，即以近代碑刻整理為題申報課題，並於 2007 年開發第一版“歷代碑刻數字化研究平臺”。^⑤2019 年國家語委重大項目成果“漢字全息資源應用系統”等，收錄可以檢索並準確定位的墓誌漢字，展示漢字“形音義用碼”五大屬性。毛遠明亦借助碑刻數據庫整理漢魏六朝石刻異體字，並編撰《漢魏六朝異體字字典》。朱智武《近 10 年來魏晉南北朝墓誌研究進展與動向分析》指出，墓

① 趙力光：《中國古代碑刻研究現狀綜述》，《碑林集刊》2005 年卷。

② 趙超：《悠悠百年，出土墓誌知多少——二十世紀有關漢唐墓誌的重要發現》，《文史知識》1999 年第 12 期。

③ 梁春勝：《六朝石刻叢考·前言》，《六朝石刻叢考》，北京：中華書局，2021 年。

④ 王寧：《數字化時代的碑刻與碑刻學研究》，《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 年第 2 期。

⑤ 參王寧《漢碑文字通釋·序言》，見王立軍：《漢碑文字通釋》，北京：中華書局，2020 年；胡佳佳等：《歷代碑刻數字化研究平臺的構建》，《數字人文》2021 年第 3 期。

誌文獻的數字化建設是未來研究的新動向。^①碑刻文字的研究手段呈現自動化、智能化的趨勢。有學者利用計算機 OCR 技術，基于卷積神經網絡進行碑刻拓片文字識別，碑刻楷字的識別正確率高達 90%，預期能大大提高拓片字形識讀和整理的速度與品質，從而推動碑刻研究的深入開展。^②

三、研究目標

本書將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作為研究對象，對其形體、結構和職用屬性進行描寫，進而闡釋其三維屬性之特點與成因，為當前漢字整理、規範等領域提供借鑒。具體研究目標如下：

（一）墓誌常用楷字的形體狀況

筆形是分析漢字書寫屬性的基本着眼點。我們參照王寧《漢字構形學導論》等論著提出的考察漢字書寫狀況的重要參數，分析墓誌常用楷字的筆形特征、筆畫數量和異寫現象等，提煉常用楷字所蘊含的書寫規則和自然美化規律。

（二）墓誌常用楷字的構形狀況

構形與漢字釋讀密切相關。漢字是表意文字，堅持“形義統一”的構形原則，而構件是漢字識別的樞紐，也是構形分析的重要抓手。我們將考察墓誌常用楷字的構件數量、構件功能和構形理據，着重描寫並統計高頻構件的異寫形式、異寫數量等，分析常用楷字中高頻構件的效用。

（三）墓誌常用楷字的職用狀況

墓誌常用楷字的職用主要包括單字的本用、兼用及借用現象。本用，是漢字記錄表達義值與形體構意有密切聯繫的詞項，如北魏元萇墓誌“清明照日，威猛凝神”中“日”字記錄名詞“太陽”。兼用，是漢

① 朱智武：《近 10 年來魏晉南北朝墓誌研究進展與動向分析》，《南京曉莊學院學報》2018 年第 3 期。

② 柯永紅：《基于卷積神經網絡的碑刻拓片楷體文字自動識別》，《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8 年第 2 期。

字記錄與本用義值有某種聯繫的引申或派生詞項，如北魏元孟輝墓誌“十一月辛未朔十五日乙酉窆於東垣之陵”中“日”字記錄“日期”“日子”義。借用，是將字形當作語音符號去記錄與該字形體無關但音同音近的詞語或音節，如唐杜方夫人刘白郭等三氏墓誌“嫡孫思禮昆季等，早喪父母，少虧庭訓，朝夕號泣，相念孤遺”中“嫡”字記錄詞語{適}，即屬借用。《章太炎說文解字授課筆記》（以下簡稱《筆記》）“嫡”條錢一：“嫗也。嫡，嫗皆謹也。嫡从帝聲，故訓謹，與諦義略同（謹則審諦矣）。嫡庶＝適庶。”可為佐證。

我們既進行單字職用的描寫，又對相關諸字進行類聚分析。人名、地名、職官等專名用字所記錄的語詞因構詞理據較複雜，暫不作為職用考察的重點。具體而言，首先考察墓誌常用楷字每個單字的記錄單位，判斷是單音詞、雙音節連綿詞的音節，還是雙音節合成詞的語素等，繼而描寫其記錄職能。

（四）墓誌常用楷字“形構用”綜合分析與闡釋

對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從形體、結構和職用三個維度進行綜合分析，對有關語言文字現象做出定性和定量結論，如對曇花一現的武周新字等漢字現象進行多維闡釋等。

四、研究重點與難點

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的職用狀況是本書的研究重點。首先，我們對所選墓誌文本漢字進行字樣、字位和字種等層面的認同和別異，從同一字位眾多異寫字樣中提取字位主形，作為標領字，之後進行字頻統計，按字頻降序排列，選取最高頻的 1000 字，形成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的字集。其次，在形體和結構分析的基礎上進行單字職用狀況考察。其間，我們參考齊元濤《隋唐五代碑誌楷書構形系統研究》附錄《隋唐五代碑誌楷書構形分析總表》、羅維明《中古墓誌詞語研究》等相關研究，分析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的職用狀況。

部分單字構字理據不明，或者構意存在歧說，如何客觀描寫此類單字在具體文本中的職用屬性，是本書的難點。面對構意歧解，我們儘量

擇善而從，參考《說文》及古文字學界的權威說解，確定單字的構字理據。對於構形理據不明的字，其本用一時無法落實，則借鑒清人段玉裁主張的“造字之本義”與“用字之本義”（相當於陸宗達所說的“造意”與“實義”）之不同，將“用字之本義”（即較早的“實義”）作為起點，判斷墓誌文本漢字的具體職用狀況。

判斷具體墓誌文本語境中某單字的職用狀況，往往涉及詞義引申和詞彙派生關係；分析文字假借亦需判斷語音、語義關係。對此，我們將參考相關字書、韻書及前人字詞考釋成果，如乾嘉學者溝通字詞關係的《說文解字注》《說文通訓定聲》等著述。

五、研究意義

從依附於經學的傳統“小學”，到“中國語言文字學”的獨立，再到漢字學內部分支學科的建立，漢字漢語研究不斷深入。王寧吸收啟功字體理論，創建了漢字字體學。齊元濤將漢字構形研究從系統構成研究導向了系統生成研究。隨著漢字材料的陸續發布、漢字理論的縱深發展，關於漢字史、漢字理論和漢字應用領域尚有很多問題需要開掘。例如，漢字學研究長期忽略漢字職用，講漢字發展史一般只講形體、結構的演變，漢字職用演變的研究十分薄弱。李運富指出漢字具有形體、結構、職用三方面屬性，並逐步創建和發展了“漢字學三平面理論”（其中“漢字職用學”是“三平面”的重點），使漢字發展史、漢字理論的研究框架更為健全。

加強特殊時期、特殊材料用字的研究是漢字職用研究的一大趨勢。墓誌文本具有重要的語料價值，其時代地域明確，保持語言原貌，大都可視為“同時資料”。^①魏晉—隋唐時期墓誌文字材料載體統一，諸如魏晉南北朝的漢字形體歧異現象、武周時期的特殊用字、唐代正字法對使用文字的影響等，都是大有可為的研究領域。對於魏晉—隋唐時期墓誌文字材料，前人較多重視疑難字、俗字的考釋，對於常用字缺乏深入全面的考察。而歷代常用字正是社會效用最高的一批字，在形體和職用方面

① 太田辰夫：《中國語歷史文法・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374頁。

具有穩定性和活躍性辯證統一的特點。魏晉—隋唐又是楷書逐步形成、發展和成熟的時期，對此期墓誌常用楷字進行三個平面屬性的考察，突出重點，可收以簡馭繁之效。

本書對於完善漢字史研究和建構漢字學理論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魏晉—隋唐時期的楷書漢字屬於近代漢字的範疇，上承古代漢字，又是現代漢字的直接淵源，是“溝通古今”的重要一環。發掘相同載體——墓誌、同一體制——楷書的常用漢字在形體、結構及職用三個平面上的屬性特徵，將展現魏晉—隋唐時期先人墓誌書面語言生活的基本面貌，借此可完善“漢字學三平面理論”的學術體系。

本研究在當代漢字規範、字典辭書編纂和常用漢字教學等領域具有重要的應用價值。考察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書漢字在“形構用”三個平面的屬性狀況，可為當代漢字規範提供借鑒；墓誌常用楷字的職用文例，可為字典編纂領域提供單字義項的可靠書證；墓誌常用楷字的三維屬性特征，是考察其“過去今生”的第一手資料，作為寶貴的語言文字資源，可活化運用於當今漢字漢語教育領域。

第二章 墓誌常用楷字的整理程序 與研究方法

一、墓誌源流概說

墓誌是從古代喪葬禮俗衍生出的一種特殊應用文體。清人葉昌熾《語石》、當代趙超《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前言》《中國古代石刻概論》、徐自強《古代石刻通論》、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等對於墓誌的起源、形制、文體及內容等多有論及。^①以下結合前賢論述及新見材料，對墓誌源流作簡要梳理。

墓誌通常指埋葬于墓室中的誌墓文本。從實物載體看，墓誌有木、石、磚等不同材質，而以石質居多。從形制方面看，成熟的墓誌往往兩石相合，即盪頂式誌蓋加上方形誌石組成一盒，平放于墓棺之前（見圖 2.1）。



圖 2.1 唐上官婉兒墓誌

石刻文獻源遠流長，因其材質的耐久性及其有關禮儀制度的規定，石刻早已成為漢字文本的重要載體。今日出土實物漢字材料中，石刻漢字

^① 見毛遠明：《碑刻文獻學通論》第三章《碑刻文獻的內容》第二節《哀誄紀念碑刻》，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第191-207頁。

始見于戰國中山（見圖 2.2）。^①有學者研究指出，石鼓文的時代最可能屬於春秋晚期早段。^②

墓碑、墓誌和墓表等石刻文獻具有記事、標識的社會功能，蓋發源于銘旌（見圖 2.3）。《周禮·春官·司常》：“大喪，共銘旌。”啓功說：“武威發現許多的漢墓，包括西漢至東漢晚期的。其中發現許多銘旌。……銘旌是在靈前舉揚的，性質極其鄭重，因之要用古體或‘雅體’的字。”^③唐李白詩《上留田》：“昔之弟死兄不葬，他人于此舉銘旌。”墓誌源于銘旌，亦可從詞彙系統得到佐證。北魏元秀墓誌（523）：“泉扃一夜，千祀不晨，陵谷儻移，埏隧更遷，故銘石幽壤，飾旌遺塵。”唐鄭善妃墓誌（617）：“痛慈顏之永遠，泣淵泉之幽邃，慮桑海之遷移，書玄石以旌記。”上引誌文中銘、旌二字均為魏晉—隋唐墓誌常用楷字，檢索魏晉—隋唐 316 方楷書墓誌（見附錄一）文本，可知“銘”字出現 471 次，“旌”字出現 42 次。“銘”常訓為“記”。游旌與旗幟二物同類，皆有標誌功能，幟、識為音近義通的同源詞。^④可見，“銘旌”名實相符，銘、旌二字皆有標記、表徵義。秦漢時刑徒墓葬中刻記死者身份、籍貫、名字的磚瓦，可視為原始的墓誌。^⑤



圖 2.2 戰國中山石刻^⑥



圖 2.3 武威銘旌^⑦

① 啓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4 頁。

②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65 頁。

③ 啓功：《古代字體論稿》，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21 頁。

④ 參陸宗達、王寧：《“職”“志”同源說》，載《訓詁與訓詁學》，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年，第 228-231 頁。

⑤ 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第 81 頁。

⑥ 采自啓功：《古代字體論稿》附圖 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118 頁。

⑦ 采自啓功：《古代字體論稿》圖版 5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77 頁。